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m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6



中华春秋

# 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

□ 刘庭华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枢纽，在这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生死决战中，中华民族发扬了“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传统精神，空前地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伟大旗帜下，一致对外，共赴国难，奋勇抵抗，最终打败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

## 共产党中流砥柱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是现代中国两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了武装抗日的爱国主义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1月，毛泽东、朱德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国民党军队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建议。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12月，中国共产党又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在全国各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从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伟大的政治胸怀和宽宏精神，在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上由“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最后调整为“联蒋抗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促成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国共两党由此走上了第二次合作的道路。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声明在政策上作出更大调整，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之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抗战宣言，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 国民党的重要作用

国民党作为中国当时的执政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一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丢失了东北三省和华北不少国土，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谴责。1935年华北事变后，蒋介石面对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迫近、华北即将沦为第二个“满洲国”的危险，也开始逐步调整自己的政策，由对日妥协转向强硬，对日本的无理要求给予回绝，在军事上也开始整军备战，在内政上则逐渐变“攘外必先安内”为“攘外”与“安内”并举。特别是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进一步加大了准备抗战的力度，改组国民政府，调整内外政策，加紧抵抗日本侵略的军事准备，并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谈判。七七事变后，国民党进一步坚定了抗战的决心。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强调“如是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宣称：“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15日蒋介石下达全国抗战的总动员令，国民政府还开放了党禁，承认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其他政党的合法性，释放了政治犯，接受并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承认了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可以说，蒋介石“7·17”讲话是国民党政府反对妥协退让、主张坚决抗战的宣言。它“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 民主党派通力合作

中国的民主党派，抗战前大都既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一党独裁专政，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一直从事第三条道路的斗争。但是，在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它们纷纷改变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或放弃反蒋，或放弃反共，都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并积极从事推动全民族的团结抗日活动。中华革命党把自己的组织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放弃反蒋斗争，主张联蒋抗日，号召“一切革命的党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后关头中，应该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下，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可以说，这代表了所有民主党派的共同愿望。七七事变后，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呼吁全民族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宣言中说：“抗日的利益包括一切人民的利益，除汉奸外，全国上下，不分党派，无间朝野，为民族利益计，为自身及子孙计，都应牺牲其特殊利益、财产生命，团结一致，共同向战胜暴日的一个目标前进。”当国共两党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第二次合作时，各民主党派更是表示坚决支持和拥护，并积极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 军事集团共御外侮

国民党各政治、军事集团及地方实力派为争权夺利一直明争暗斗，闹独立，搞分裂，上演了一幕幕军阀混战的丑剧。但是，随着日军侵占东北，侵入华北，各政治、军事集团和地方实力派逐渐认识到只有全民族团结御侮，中国才能免遭灭亡，因而要求结束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声愈来愈高。不少军事集团公开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有的甚至主张联共抗日。以陈济棠、李宗仁为首的西南实力派集团发动两广事变，要求北上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力促团结抗战。这都有力地促使了蒋介石国民党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下定团结抗战的决心。

到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爆发时，各政治、军事集团及地方实力派全部都采取归顺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态度，表示服从国民政府，团结一致抗日，同仇敌忾，英勇杀敌。如淞沪会战时，白崇禧在蒋系中央军部队遭受严重损失时，把桂系6个主力师调作反攻之用，结果失利，伤亡官兵5万余人。又如台儿庄战役时，原西北军张自忠在内战时，与庞炳勋结下仇恨，他俩同为冯玉祥的部下，中原大战时，庞炳勋被蒋介石收买，张自忠被庞暗中打黑枪险遭丧命，张自忠曾表示一辈子决不与庞共事。但是，当庞部在临沂被日军包围，处于危难之时，张自忠奉李仁宗之命主动率部星夜增援，击破了日军。这种不记私仇，自觉服从全民族抗战大局利益的凛然大义，必载于史册而为后人所铭记。

各阶级、政党、派别、军事集团这种舍去旧有恩恩怨怨，均能以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爱国主义精神，凝聚他们朝着驱逐日本侵略军的共同目标走到了一起。因而，爱国主义团结了他们，爱国主义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政治思想基础。

比如山西的阎锡山，面临日军侵入山西的危机，在1936年5月即采取“联共抗日”的政策，于同年秋与中共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欢迎共产党人帮助他建立实际上由中共领导的、动员和组织山西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牺盟会”。七七事变后不久，建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总队，在山西五台山地区进行游击战活动，到1938年初发展到第1、2、3、4纵队（相当于旅），简称山西新军，约3万余人，成为山西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以徐州会战为例，可以说，徐州会战是全民族团结抵御外敌入侵的典范。近代中国军阀割据，山头林立，内战不断。但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些军队能够不分派系，不讲山头，捐弃前嫌，同仇敌忾，为民族生存而战。日军曾视中国人民为一盘散沙，视中国军队为草芥。而徐州会战则体现了全阶层、全民族团结抗战的精神。于是，在滕县保卫战、临沂大捷、台儿庄大捷等战斗中，有来自不同省份，操着不同口音，身着不同服装的军人，他们中有东北军、西北军、川军、桂军、滇军……正是这些地方军使日本矶谷、板垣两个精锐师团溃败而逃。而台儿庄大捷、徐州突围，则为李宗仁赢得了抗日英雄、抗日功臣和抗日名将的三顶桂冠。

人物志

# “戊戌”的“第七君子”

□ 游宇明

张荫桓（1837－1900年），字樵阳，广东省南海县人。早年考秀才不第，二十一岁纳资买了知县官衔，入山东巡抚幕府做文书，后来升迁至道员。光绪八年，任安徽按察使。光绪十年，被朝廷授三品卿衔，命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次年，出任特使，奔赴美国、秘鲁、西班牙三国。张荫桓是个很有脑子又非常能干的官员，未入仕即努力学习外语，用心研究洋务。出使时成绩显赫，比如设领事保护侨民，建立华人中西学堂，教育华人自尊自爱、团结互助，维护华工的合法权益，为屈死的200多名华工讨得147万多墨西哥银元的赔偿，并订立协议使外国人再也不敢随意杀害华人，同时，他还对西方社会进行全面考察，回国后，即向朝廷呈献反映出使过程的《三洲日记》。张荫桓的工作得到了朝廷的肯定，归国不久，即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兼户部侍郎，赏加尚书衔，进入从一品大员的行列。这在不是科举出身，又无特别军功的汉族大臣中是非常罕见的。光绪二十三年，张荫桓代表朝廷赴伦敦参加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周年庆典，后来又去了法国、德国、俄国、美国，对外国事务再次作了一番细致深入的了解。

或许是觉得张荫桓长年从事外交，见识超拔，决意变法的光绪帝对张荫桓非常器重，经常召见他，仅在戊戌年三月，就连续7次召见。保守派大臣弹劾张荫桓蛊惑圣上，要求将其囚禁，光绪帝不予理睬。当年6月11日，光绪帝毅然下诏，起用维新人士，正式变法。

改革也好，革命也罢，本质上是一种利益调整，戊戌变法加大了皇帝的权力，相应地自然会减少皇太后的权威，加上以康有为为精神领袖的维新派对变法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居然准备采取兵围颐和园、杀掉慈禧太后的冒险之策，原本对新法多少有几分支持的慈禧太后彻底翻脸。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住地颐和园回到紫禁城，宣布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随后发布训政诏书，下令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维新人士，并要求地方督抚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

做外交官的人往往都有国际朋友，张荫桓也不例外。他被捕之后，英国公使窦纳乐第一时间就给李鸿章写信，想保住张荫桓。窦纳乐还致信日本公使林权助，请求当时在清国的伊藤博文帮忙。与伊藤博文商量后，林权助亲自去见李鸿章，希望他助援张荫桓。李鸿章最初没有同意，林权助威胁他说：杀掉张荫桓肯定会引起西方各国干涉。此时，李鸿章才给荣禄写了一封信，拜托他想想办法。荣禄是慈禧的宠臣，又是镇压戊戌变法的“功臣”，他提的建议，慈禧还是会听听的，就这样，张荫桓就与李鸿章想保的徐致靖一起保住了性命。

然而，慈禧虽然给了荣禄一个面子，心里却一直想着怎样重重地惩罚一下张荫桓，她先是以“居心巧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的罪名将张荫桓流放新疆，两年之后又下令将他杀害。至此，戊戌变法的死难者实际上增加一人，张荫桓成了戊戌变法喋血的第七君子。

# 讲述中美蜜月期的故事

## ——访导演傅红星

近日，电影《旋风九日》热映，该电影讲述了1979年初邓小平访美的事件，其中一些历史影像资料第一次被披露，引起国内外关注。

□ 本报记者 曹颖新

**记者：**《旋风九日》这部电影讲述了36年前发生在中美刚刚建交之后邓小平访美的事件，这既是一个重大的外交事件，也是一段非常好看的故事。您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呢？

**傅红星：**我在拍这部电影前，恰好中美关系正在快速下滑，到现在，这种下滑滑到了一个令人焦虑的状态。我不能判断未来，但我能讲述历史，让历史告诉未来，这是我作为一个导演的工作。我要通过讲述故事，把虚的中美关系实化、影像化。

美国副总统拜登和汪洋副总理在公开场合都把中美关系描述为婚姻关系，很多人也认同此点。我们在筹划和拍摄电影时发现，中美这个婚姻的双方开始吵架，甚至闹到要离婚的地步，这时需要冷静下来思考，当初为什么要结婚，当初的蜜月期是什么样的。邓小平访美这9天，就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我讲述中美蜜月期的故事，是想提示大家应有更宽广的历史胸怀，珍视彼此感情，理性看待相互关系。

新中国同美国调整关系一直走到建交，这段进程非常不易。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想去访问美国，但是都没有实现，而历史选择了邓小平最终实现了访美，就像历史选择了邓小平成为改革开放的设计师。改革开放是一部宏大剧作，邓小平访美就是在国际舞台上的开幕大戏，它向全世界宣告中国要改革开放了。有人说，这部电影是中国主旋律，我说这是世界的主旋律，中国的改革开放融入了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旋律。中国过去不太跟世界合作，总是在想怎么打仗，内部的主旋律也是斗争，但是现在中国走入了与世界合作的新时代，中美建交紧接着之后的邓小平访美开启了这个时代。它同时也成为改变冷战格局的重大动作，因为对于中美两国来讲，缔结婚姻，需要周围各方的关注和认可，这就意味着，世界各国要审视两个重要力量联合对世界格局的改变。所以我把这改变中美关系也改变世界格局的9天拍成了电影。

**记者：**观看这部电影是愉悦的，不论是当年的影像资料，还是您摄像机中的当下时空，都是有温度的。您想通过电影向观众传达哪些想法呢？

**傅红星：**电影有很多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好看与否，即是否能满足感官娱乐需求；第二个层次是是否有意思，即是否能让观众走出影院后回味这个故事；第三个层次是是否有价值，即能引发观众电影以外的思考，甚至多年以后，仍能回想起这部电影探讨的超越时间的价值。如果想做到第三个层次，首先导演要体悟到这些价值，而且要有通过影像讲述这些价值的能力，所以我不想去说教，我想让观众观看这些故事时，在各自的前认知基础上产生价值判断，产生更多思考。

现在对中美关系有一些很不冷静的声音出来，对此，我作为导演，需要用电影的方式告诉大家，我们必须理性地看过去走过的路。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强大的国家，它一定是理性的，领袖和公众都要保持理性。对于中国人来说，既要反对“左”，又要反对右，尤其要反对“左”。不左不右才是一条正确的路，在左右中间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才是民心所向，才符合世界潮流。我们的工作是通过电影引发大家对历史、对现实的思考，不仅对中国人讲述这个故事，也对美国人讲述，接下来我要带着这部电影去美国，因为美国人也很关心中国人怎么看待中美关系，中国人怎么讲述当初的历史。作为导演，我想做连接的工作，不仅连接中美，也连接历史、现在和未来，从未来去看历史。

**记者：**这部纪录片的一部分是当年的影像资料，而您用当事人的回忆和讲述把这些影像连缀起来，使得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讲述历史的人物在镜头前也变得熠熠生辉。您是怎样处理这些人物的？

**傅红星：**导演拍电影，很像厨师做菜，要把胡萝卜的味道炖到牛肉里，同时把牛肉的滋味炖进胡萝卜里，这个过程的关键是怎样配料与掌握烹调火候。在处理这部纪录片的人物时，我把历史的讲述者与影像资料结合在一起。在讲述故事过程中，邓小平、卡特、布热津斯基等人物就会一一走进来。中美关系复杂而伟大，真实而温暖，所有国家的关系都是人的关系，所以它是有温度的。比如伍德科克（时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夫人，她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只是因为爱情，与伍德科克结婚，被卷入了一场伟大的政治事件，她对那段历史的回忆伴随着她个人美好的回忆。如果你去思考这个事件中的伍德科克这个人物，也不可避免地会想到他的情感与政治的关系。他在恋爱中完成了与邓小平的政治谈判，你可以想象他的感情对促成这场谈判的正面影响。大使很幸福，邓小平同样有很幸福的家庭生活，所以他们的谈判一定有利于两国人民（《病夫治国》则揭示了相反的情况）。

观众反映，电影里伍德科克夫人望着远山的背影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那个镜头昭示着她的内心，她希望中美关系能一直好下去。和她一样，当年的那些事件参与者都有这样的希望，他们都清楚，两国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好的中美关系会使全世界人受惠，所以他们很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让他们接受采访不容易，但是因为中美关系，因为邓小平，就变得容易了。我在片中选取了布热津斯基一段对邓小平的深情回忆，那是在两国建交前，布热津斯基访华，邓小平在饭桌上向他讲述自己初到法国留学时的感受。邓小平说，他一直都认为自己的祖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但是到了法国，他看到了西方的现代文明，才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祖国离先进文明还有太大的差距，从此，想改变本民族命运的急切盼望使他选择了共产主义。可是他们那代人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奋斗了50多年，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那么大，他的急切心情可想而知。布热津斯基非常理解邓小平，因为他们都是在那个层面上思考问题的人，卡特总统当时也接受了邓小平传达的信息，因此下定决心，力排众议，又很巧妙地促成了中美建交。

卡特和布热津斯基等人现在仍在思考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所以在接受采访时有说不完的话。布热津斯基在接受采访后还在不停地说，不停地问，我就让机器开着，跟他对话。他问我：中国人现在怎么看待邓小平？我把这个问题带给了接受采访的中国人——姚明、俞敏洪、雷军、潘石屹、柳传志，还有留学生、快递员等普通人，他们对邓小平及其开创的时代有自己的评价，我把这些评价放在影片彩蛋的部分，因为他们的镜头是电影的一部分，就像他们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今天所有人创造的历史还在继续。

**记者：**电影对邓小平访美幕后保安工作的再现向观众揭示了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当年中方的贴身安保人员张宝忠、孙勇和美方的保镖保罗·凯利，不仅讲述了两次遇袭事件的化险为夷，也讲述了因这段“生死之交”结下的友谊。孙勇讲述的故事让观众忍俊不禁，他在向摄制组讲述时，你们也感受到走向历史真实的惊喜了吗？

**傅红星：**对啊，这就是纪录片的魅力，随着人物的娓娓道来，我们才会知道新闻事件背后真实发生的事，把这些新闻报道里没讲的事拍成纪录片，观众就可以到电影院去看。拍纪录片不仅是触摸历史，更是触摸人物的内心。电影中那两个德克萨斯州姐妹从来没想过自己的经历会被拍进电影，她们就是普通的“乡下姑娘”，就喜欢骑马。当年邓小平去德克萨斯州看了她们的表演，给她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所以她们在谈起这件事时还很动感情，这就是外交中的人情味。

在采访美国当事人时，我还被他们保留档案、记录历史的精神所震撼，比如其中一位当事人，保存了若干年《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报纸和大量的刊物。每个人都很重视信件、资料的保存和分类，社会和国家层面更是重视档案馆、资料馆和图书馆的建设。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不仅要看它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生产能力，也要看它知识的保存能力，保存地越多越全，知识的再生产能力越高，知识谱系才会越来越健全，这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记者：**这部电影采用了很多动漫的手法，使重大题材变得非常轻松，当初您是怎么考虑用动漫来进行形式上的突破呢？

**傅红星：**形式要与内容结合起来，比如邓小平去NASA考察，在那些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成果面前，他被深深震撼，他在模拟操控室里像个孩子一样好奇。他看到了美国梦的实现，他自己也有个中国梦，一个老人像孩子一样的梦，这个梦用动漫表现最合适。他个人有他的中国梦，整个中国也正焕发出青春的光彩，用动漫来表现这个年轻的国家的活力是很合适的。用动漫手法是一个冒险，拍到一半的时候曾经被否定过，但是我和制片人坚持这种创新，现在看来创新是成功的，观众们都很喜欢。

中华“和”文化
一印一书法系列作品



作者：李铁




作者：阿朗一笔
和同可观